

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

不屈者 言

史仲文 主编

中国物资出版社

32

不屈者言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不屈者言/史仲文主编.-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7.8

ISBN 7-5047-1400-3

I. 中… II. 史… III. 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文集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55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字数:501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47-1400-3/G · 0271

定 价:26.80 元

呜咽壮烈的一段中国史

《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导言

为着说明编译本书的缘故，先应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背景。

我们中国人热爱历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我们热爱历史，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无比辉煌的独特的历史历程。

中国历史的辉煌，人己所知，中国历史的独特还有待研究。大而言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自有其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三大特征：

其一曰，5000年文明，未曾断层。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于，中华文明虽然不是最为古老的，但却没有出现任何文化断层。“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文明依然是中华文明。

其二曰，5000年文明，不曾分裂。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列国纷争，也有过封疆裂土，也有过南北对峙，也有过封建割据。然而，分裂不合中国文化之道，不合中华民族之心，一个罗马帝国可以分裂成数十个国家而后强，伟大的中华民族只有走向统一才能强盛。分裂必不长久，统一才有光明。罗贯中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分是歧途，合为正道，大道在于人心，虽然几经分治，必定走向统一。

其三曰,5000年文明,以世俗为本。虽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几乎任何一种教派都可在中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中国却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而是世俗性国家。爱教更要爱国,爱国才能兴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绝少出现过宗教迫害。中国历史文化主流属于儒家文化,儒家的鬼神观念是“敬鬼神而远之”。信仰只作信仰,但不让非人的力量干扰和破坏人间的生活。

但要说明:中国历史固然辉煌,但并不一味闭关自守;中国历史固然伟大,但绝不拒绝接受新的文明。

相反,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正是一个不断地吸收新文化、接纳新文明,不断地进行新的文化融合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少自商、周以来,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虽然其融合形态,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或者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或者是两相碰撞,终于一蹴而就的,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或者是和风细雨的,或者是充满拼杀的,或者是朝气蓬勃、龙飞凤舞的,或者是生灵涂炭、以亿万生命作代价的。

然无论如何,唯有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民族生命才有无限生机,唯有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民族文化才能赶上甚至领导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

中国文化通过不断的弃旧从新,使自己成为各种人类文明形态中的一只不死鸟;

中华民族通过不断的融合,使自己数次成为火中的凤凰。

简而言之,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极其重要的文化融合,正是这三次极其重要的文化融合,才使得中华文明虽历数千年而不衰,才构成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历史风格。

这三次文化融合是:

春秋战国时代的南北文化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与民族大融合;

以及自1840年发始,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中、西文化大融合。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南北文化大融合,主要是华夏民族间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最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融合,既扩大了地域范围,又扩大了民族范围,而且最终使佛学文化在中国这块滋养丰盛的文化土地上扎下了根,并因此造就了闻名和领先于世界的盛唐文化。那么,现在仍在持续的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大融合,就必定会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作出符合自己历史身份与民族身份的文明贡献,从而实现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

从文化品性上看,第一次文化融合,是从奴隶制时代走向封建时代的一次大革命;第二次文化融合,则是从旧的封建文明走向新的封建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唯有这第三次文化融合,乃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迎来中国,从而使中国从落后的封建时代走向现代文明的一次生死攸关的大冲杀。

本书所编选的人物与文章,正是这伟大的中、西文明大融通历史的“第一时间”。

这个“第一时间”,自1840年林则徐广东禁烟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换句话说,从1840年至1911年这70余年的历史,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第三次文化巨变的第一阶段。

从1840年到1911年,不过短短的71年时间。然而,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是一段披肝沥胆的历史;这是一段幽咽哀痛的历史;这是一段壮丽如虹的历史。历史时流并非恒速,波峰波谷泾渭分明。回首往昔,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一段以血写成的历史,以泪写成的历史,以恨写成的历史。

从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到孙中山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先是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又有太平天国起义,再有洋务运动,又有戊戌变法,接下来的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七十年间,五次运动,中国的志士仁人,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血,探索一切道

路，追寻一切可能。从外交谈判到兵戎相见；从藐视洋兵器到引进、制造洋兵器；从唯我独尊到学习夷技；从闭关自守到国门洞开；从只知办科举、习八股，到选派成千上万的留学生；从只知给孔圣人磕头，到翻译和介绍各种西洋书籍。

就这些不同的相互交接的历史运动而言，它们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水火难容的。林则徐就不能同意太平天国；洪秀全也不能同意曾国藩；曾、李、左、胡依然不能同意戊戌变法，而康有为也不能同意孙中山。

这些不同历史运动的对立，导致了领导这些运动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对立；而这些领袖人物的对立更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对立。于是相互冲撞，相互辩诘，相互批判，甚至相互仇杀，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也在这些冲撞、辩诘、批判和仇杀中，廓清了历史前进的脉络。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首望去，这段纷乱的历史，正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也是一个阶升梯进的过程。换个通俗的说法，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林则徐、没有洪秀全、没有曾国藩，或者没有康有为、或者没有孙中山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去考虑问题：没有鸦片战争，怎么会有洋务运动；没有洋务运动，怎么会有戊戌变法；没有戊戌变法，又怎么会有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

作为这些历史人物的继承者，我们读这些前人的文献，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你死我活的对垒阵营之中，也有着对于历史和现实相似或相近的意见与评论。只消看一看太平天国晚期领袖人物之一的洪仁玕的文章和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主张，就可以知道太平天国失败后，固然会掀起一场意义深远的洋务运动；就是太平天国胜利了，还是会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可见，智者之心既有相通之处，洋务运动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

从林则徐到孙中山,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可说前赴后继,代有英贤。虽然他们各自的见解不同,个人的性格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信奉的理念不同。但他们都是些先公后私、当仁不让的时代俊杰,他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中国历史的脊梁。

这是一个惊涛骇浪、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时代;

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历史时代;

一个千古难逢的时代,必定造就一些千古风流人物。

这些人物中:

有民族英雄林则徐;

有与林则徐同心同德同荣共辱的邓廷桢;

有远见卓识,在中国未享大名,而在日本倍受重视的杰出思想家魏源;

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有为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终于死而不得其所的杨秀清;

有令清军将领恨之入骨,终于兵败被俘,写下沉痛直千古的自述的忠王李秀成;

有洪秀全胞弟,对西方世界有着崭新认识的洪仁玕;

有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有胆有识的留学生鼻祖容闳;

有被称为中兴名臣,又被讥为“野狐狸”,被尊为清代大儒,又被骂作刽子手的曾国藩;

有既带些儒气又带些痞气,能军事又能政务,终于因为“弱国无外交”而落一个汉奸罪名的李鸿章;

有与李鸿章齐名,力主收复新疆且立下不世之功的湘军大将左宗棠;

有原本属于清流,后来终于成为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张之洞;

有身为幕僚,胸怀天下,号称时务巨擘的薛福成;

有身为买办,通达贸易,又有新思想新见解,充满民族危机感,

并因而写下《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有游历欧洲，有才气且有大志向但终于未能一显政治身手的王韬；

有因为抗英而被清朝政府迫害的姚莹；

有怀着一腔爱国心的大书法理论家包世臣；

有《马氏文通》作者，身为大学者又充满爱国热忱，不揣冒昧，勇于进言的马建忠；

有小刀会领袖刘丽川；

有黑旗军将领刘永福；

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

有湘军名将刘铭传；

有大翻译家严复；

有新文化人物朱执信；

有大实业家兼大爱国者张謇；

有高张变法旗帜，胸藏大同理想的康有为；

有一代变法宗师又是一代文化宗师的梁启超；

有认定变法必定流血，流血不后他人的谭嗣同；

有革命军中马前卒，少年英才邹容；

有与康、梁大战，大呼载祐小儿的章太炎；

有鉴湖女侠秋瑾；

有忧国至五内俱焚，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的陈天华；

有立志君主立宪，不幸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帮凶，几经周折，终于成为共产党人的杨度；

有国民党元老，宣扬《民报六大主义》的胡汉民；

有国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

一切关心中国近代史的中国人，一切关心中国的未来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对于上述这些历史人物，纵非心受，岂无耳闻？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介绍他们的文章、书籍、小说、散文、电

影、电视，可谓多矣。然而那终究不过是后人的见解，或者旁人的“取相”。本书不重议论，不多评述，只将他们那些有代表或有特色的文章文字，按专题收集排列，让关心他们也关心中国历史的人们，看看他们的本来面貌，听听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

对这些历史人物，我们切不可把他们文物化了，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历史人物而已。殊不知，这些人物，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他们雄姿英发，不让前贤；品位卓异，何惧后人。想当初，梁启超见张之洞，张之洞有意煞一煞这位后学的锐气。彼时张为封疆大吏，官居武汉。武汉古称江夏，于是张之洞出一上联，联曰：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好一个梁启超，只管不慌不忙，从容答道：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对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也不该把他们简单化了。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不能生动而深刻地感知他们——并非他们离我们太过遥远，而是我们没有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丰富得很。甚至可以这样说，举凡我们后来碰到的问题，在那里，均已经初见端倪。或者说他们已然碰到过、思考过、也提问过了。例如，国体问题、民主问题、科学问题、军队问题、教育问题、工业问题、农业问题、交通问题、人口问题、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私人资本问题、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国民素质问题乃至中、西方文化关系与前途问题等等。不是有人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吗？那么，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些第一次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首先提出问题的人物，我们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同情与尊重——尽管他们并非最后的胜者也罢。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70余年，对外，则面对西方侵略者的强权政治和西方文明的冲击；对内，则面对封建末世的无可救药的腐朽

与破败。

西方文明固然大大先进于东方，而帝国主义的掠夺式进入，则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封建末世的腐朽与破败，固已病入膏肓，但有 5000 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又绝不甘心灭亡，也绝不可能就此灭亡。

内忧外患，令人窒息，但内忧外患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唯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敢于向命运挑战者可以获得新生。

从纵的方面看，中国近代史上的这 70 余年，经历了物器引进、制度引进和思想文化引进三个阶段。

所谓物器引进，即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出现的“以夷治夷”的文化思潮。表现在社会行为方面，最为突出的社会大行动就是洋务运动。

中国人固然有 5000 年文明，但中国的冷兵器，绝对打不过西洋人的热兵器。关云长的大刀，无论如何抵不住英国人的火枪；中国人的红衣火炮，也终究抵不住英国人的兵舰。于是开明的中国人，早醒的中国人，有实践经验和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对敌人的快枪巨炮绝不屈服的中国人，就开始倡导以夷人之技战胜夷人；以夷人之器对付夷人。你是孙悟空，我就取你的铁棒；你是蝎子精，我就夺你的毒汁。关云长的大刀既然抵不住洋毛子的快枪，那么，关云长就不用大刀好了，也取一把快枪过来，我们再重新较量。

“以夷治夷”，堪称妙法，然而，看那效果，却令人寒心。

物器可以引进中国，但是，制度不对，依然不能战胜敌人。关云长终于使不惯洋人的快枪。而且他老人家脑子里只有忠义二字，什么洋枪洋炮，一概油盐不进。

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早醒的中国人，不屈的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国仇家恨的中国人，便开始变革旧体制。于是洋务运动告一段落，变法维新活动渐次走上历史的前台。

变法维新，其内涵亦深矣大矣。但根本之点，在于反对君主专

制的旧体制,要求确立君主立宪的新体制。君主立宪,并非不要君主,而是反对皇帝一人大权专揽,主张以立宪方式帮助君王,富强国家。

君主立宪,对于有 5000 年历史的中国人而言,真是闻所未闻。这件事对年轻有志但权势未稳的光绪皇帝而言,固然是闻之大喜;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帮保皇党们,却听都不要听的。于是维新不过百日,便大祸临头。光绪被囚禁,康、梁出逃,六君子被杀。虽然谭嗣同大义凛然,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且作绝命诗云: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但改良已成泡影,唯有革命才有前途,康有为不明此理,很快成为历史旧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继而掀起新的惊涛骇浪。

然而,制度的改变,需要人心作保证,需要相应的文化作支撑。没有共和文化哪来共和文明?没有人文思想哪有人文革命?于是文化制度的引入转向思想文化的引入。而思想文化引入的高潮,在于 1919 年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过这已经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了。

从横的方向看,中国近代史上的这 70 余年,则在三个基本方面进行了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生死抗争。将这三个方面的个人历史文献,分编成册,便是本书的“三言”。

反映对西方侵略势力顽强反抗的,是为《不屈者言》;

反映对封建体制不断否定的,是为《变革者言》;

反映对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经济技术学习借鉴的,是为《建业者言》;

“三言”相互联系,本为一体。以《不屈者言》为例:反抗封建压迫,固然是不屈;抗击外国侵略势力,同样是不屈。就是没有真的走上战场,但在内心深处,抱定一个信念,任你千变万化,本人就是不屈从于一切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恶势力,也是不屈。

但不屈者最壮烈的表现,不是墨写的檄文,而是血写的事实;

不是充满仇恨的文字，而是生命的冲杀。我们中华民族，正是以血肉之躯作资产，以宝贵的生命作代价，誓与一切压迫势力拼争到底，才有中国的今天，才有我们民族的希望。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主席引用了这名话，而且赋予它革命的含义。

因为有千千万万不怕死的中国人，近代中国虽屡战屡败，受尽屈辱，才终于死而后生，没有亡国。

即使彼时的思想志士，未以枪炮为友，而以笔墨为文，同样能够风驰电掣，意相奔腾，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乃是《革命军》。《革命军》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位年方19岁的青年人。但那文章却是大气磅礴，无可比拟，急浪惊风，一气呵成。它以它特有的气氛、气势、气魄、气概与气派震惊了中国，激警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有人说《革命军》影响虽大，但内容浅显，没有多少理论在内。这倒也是的。但受苦受难、多灾多难，到了生无其时、死无其地的中国人，第一需要生存，第二需要生存，第三还是需要生存。处在腐朽统治之下，处在死亡边缘但绝不甘心国败家亡的中国人，第一需要革命，第二需要革命，第三依然需要革命。为着生存，先要呐喊；高头讲章，且让后人。殊不知，理论也需要环境。柏林大学固然可以产生如黑格尔一样的理论家，但在生死存亡一发的战场上，首先需要的是战斗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李逵，命且不保，管他鸟的仁义道德，一见仇人，只管大喊一声“直娘贼”，便板斧舞得风车一般，向着敌阵排头砍去。

需要指明的，为国捐躯者中，作为主体的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军人和老百姓。英雄为国，留名千古；百姓为国，名都不要。所谓“杨三既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但，我们中华民族又是最富于智慧的民族，虽然不怕死，却不盲目死拼，我们是一要反抗，二要胜利。所以中国近代名人录上，就不但有林则徐，而且有张之洞；不但有关天培，而且有盛宣怀；不但有邓廷桢，而且有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李鸿章都是洋务运动的

主导人物。

洋务运动,过去也曾被讥为“买办运动”、“卖国运动”,但它在中国正式文明史上的作用与价值确是不能低估的。许多运动为中国近代的经济文明特别是中国人历史上最为短缺的工业文明打下了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然而长城虽长,但没有第一块基石,就没有长城伟大建筑的开始。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业成就,连毛泽东主席都是充分肯定的。他曾对天津工商业巨子李烛尘先生谈过,有几位先驱不能忘记:讲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我这里或者还应补充说,既不要忘记张之洞,就不该忘记李鸿章;既不要忘记张謇,就不该忘记盛宣怀;既不要忘记范旭东,就不该忘记胡雪岩。

我们中国先人常常认为“创业难,守业更难”。殊不知,守业也是创业。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看,不屈难,变革难,建业更难。如果不是建业更难,为什么会到今天中国大陆还有6000万以上的人口未能脱离贫困?打倒封建王朝易,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难。

洋务运动的主题:先是求强、再是求富。求强则全力发展军事工业;求富则扩大原有领域,不但发展军工,而且发展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电讯等等。求强不得,转向而求富,民富则国强,思路是不错的。然而,在那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系统中,又不是办几个厂、造几个船队就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甚至不是一个甚至十个洋务运动可以解决问题的。

近代中国,不但需要富强,尤其需要革命。

然而,革命与革命也有不同。有人说起义也是革命,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就是革命。但这是泛而言之。确而言之,起义固然可以称之为革命,但最好还是称之为起义,或者称之为造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描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曾特别强调,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只有造反,没有革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历史上固然有过

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有些是改朝换代的大起义。然而,起义的结果,终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依然是封建文明,依然是皇帝坐龙廷,依然是小农经济,依然是“三纲”、“五常”,依然是皇权、神权、族权、夫权。所以斯氏评述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说我们中国“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换成哲学用语,黑格尔老人作如是说: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好个大胆的黑格尔,竟敢用这等语言谈论我中华,真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中国5000年文明,3000年青史,难道什么进步也没有,只会在原地转圈圈吗?

只是在事实上,虽然朝朝代代,甚至日日夜夜,中国都有进步,中国的文明成果都有发展,可惜其文明类型和文明形态,确实进展不多。所以中国虽有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但这些发明在中国的作用却是小而又小,而一旦与西方近代文明相联系,便产生天翻地覆的大作用。

这样看来,造反或者起义,当真不能称为革命了。革命是要改变旧的文化结构、旧的政治关系、旧的社会形态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称为革命之举的,不是浴血冲杀的太平天国起义军,而是从儒学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康有为、梁启超,是他们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

虽然戊戌变法运动依然忠于皇权,依然效忠皇帝;虽然它所力主的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然而,君主立宪百代不闻。请问,秦始皇听说过君主立宪吗?汉武帝听说过君主立宪吗?朱元璋听说过君主立宪吗?康熙大帝听说过君主立宪吗?没有,这等好事,他们一个也没听说过。但康有为偏能乘时而作,殚虑中华,毅然上书,要求变法。

变法是短命的,但革命的作用不以时间而论——历史的功过原本不是时流均速的。但变法的本质在于改良,而改良近乎妥协,

偏漏妥协的药方治不好中国封建专制这个顽症。于是，改良失去历史的根据。孙中山先生后来居上，开始发动国民革命。于是，新的历史纪元，从兹开始。黑格尔描述的中国历史的圆圈图，既被康、梁的改良运动悄悄越过，又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一举打破。

令中国历史老人百年而难开颜一笑的是：中国 70 余年的近代史，可说是殚精竭虑，百药尝遍，却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禁烟不成，吃了败仗，还要签订不平等条约；造反不成，虽然打了许许多多胜仗，终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不成，洋枪洋炮到了中国人手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庞大的也曾独步于亚洲的大清海军，转瞬之间便成了海上的游魂；改良不成，维新运动不过 100 余天的光晕，就成了明日黄花；革命还不成，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国家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到了 1924 年，孙中山先生临终之际，还要留下遗嘱，那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太腐败了；中国的问题太严重了；中国与西方相比太落后了。凡此种种，既不是靠一时一事的努力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靠一代、两代人的努力可以解决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的腐败，不仅是政府的腐败而已，虽然政府的腐败显然处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以鸦片战争为例，中国军队之所以打不赢英国人，原因固然很多，更有一些深层面的原因，但皇帝昏庸显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先有道光皇帝，朝三暮四，好像贪吃栗子的猢猻一般；后有咸丰皇帝平庸乏味，更胜乃翁。我们只消看一看大战之际，各位代表人物的一些言谈，无须请教战史，便知胜负如何。

咸丰皇帝这样说：

“英夷背约恃强，先行开衅，并非我中国失信，惟念古来驾驭外夷终议抚，若专意用兵终非了局。”

大臣桂良这样说：

“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

可英国人并不这么看问题，义律的观念是：

“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会使今后许多年内不再发生这类惨剧，必须教训中国政府，要他懂得对外义务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巴麦尊的观念是：

“凡是能够作远征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陛下政府是有意永久占有这样的地方的。”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大臣，碰上这样的对手，中国军队不败而何？

顺便说，为着能更全面、生动地说明这一段历史，我们在编选本丛书时，不但选录了彼时中国代表人物的观点，而且附录了相当数量的反面人物或者其他负面意见。既收录了禁烟者的意见，也收录了贩烟者的意见；既收录了起义军的意见，也收录了旁观者的意见；既收录了办洋务的意见，也收录了清流家的意见；既收录了改良者的意见，也收录了革命者的意见；既收录了爱国者的意见，也收录了卖国者的意见；两相对照，是非曲直，愈见分明。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腐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换句话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皇帝、几位大臣或几届政府的腐败而已。它的腐败尤其表现在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文化结构方面。实实在在，中国近代社会进入旧有文明的死胡同——它已经全然衰朽，彻底没落了。对这样的社会，唯有将其全然摧毁，才有再生之机。

然而，谈何容易！

我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文明，属于一种超稳定性质的元化结构体。它首先是一元性质的，所谓一元性质，即专制性质，皇权第一，无可抗衡。而且这种专制，又十分稳固地建立在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系统之上。所谓超稳定社会系统，包括家——国同